

左春台财经杂文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目 录

序	李成瑞	(1)
吃喝风处于什么阶段呢？（读报随想之一）		(7)
令行禁止，领导要带头（读报随想之二）		(11)
自负盈亏的“自”，究竟指的是谁？（读报随想之三）		(13)
“副作用研究所”和“不可行性论证”（读报随想之四）		(18)
西洋化并不等于现代化（读报随想之五）		(21)
行政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好的（读报随想 之六）		(25)
敢于实事求是，善于择善而从（读报随想之七）		(29)
从设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想到的（读报随想之八）		(34)
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是怎样被“污染”和被破坏的？ （读报随想之九）		(41)
向家庭的女财政部长们学习（读报随想之十）		(49)
过犹不及（读报随想之十一）		(53)
不能图快，不要怕羞（读报随想之十二）		(56)
调查研究要连续进行（读报随想之十三）		(60)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历史巨人（读报随想之十四）		(64)
顾全大局、团结战斗的楷模（读报随想之十五）		(74)
加强学习，改进工作（读报随想之十六）		(79)
“拒腐蚀，永不沾”（读报随想之十七）		(87)
一个企业的“五任同堂”（读报随想之十八）		(95)

怎样看，怎样想，怎样写..... (97)

真理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 (108)

回顾与联想..... (113)

—“超”—“高”值得研究..... (122)

“刘邓关系”—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126)

财政辩证法五例..... (131)

在“有法必依”上下功夫..... (136)

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 (139)

再过几年紧日子..... (142)

从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想到的..... (148)

从“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想到的..... (152)

平平之言，不可轻视..... (158)

未然之言和不及之悔..... (160)

死与活..... (162)

“摸着石头过河”与经济改革..... (165)

大家都应当象郭老那样算一笔帐..... (167)

从“愿相公无权”谈起..... (169)

勤与俭..... (173)

晓之以理，导之以规，绳之以法

——马服君依法征税的故事..... (177)

大家都应当象陈景润那样学会算帐..... (180)

“松绑”和法制..... (18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6)

万变不离其宗..... (191)

要有一股共产主义的“傻劲”..... (194)

财政工作的职业道德..... (197)

特权与枷锁..... (205)

急与骄..... (207)

欢庆与信心..... (212)

财政工作者脑子里要有一个方针..... (216)

钱多未必好办事..... (218)

不要打摆子..... (222)

财政工作中的辩证法..... (223)

两点论，不要一点论..... (231)

慈不理财..... (235)

忍小谋大..... (238)

能建离地的高楼吗？..... (241)

岂能一烧了之？..... (243)

附录：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财政》简介..... (245)

 不是反思的反思

 ——对十年改革思考的笔记式提纲..... (260)

 在治理整顿中加强银行与财政的相互支持..... (282)

 左春台同志生平..... (288)

 编后..... (290)

序

当我提起笔来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不由得悲从中来，热泪盈眶。因为本书的作者刚刚在三个月以前——1990年10月19日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但另一方面，这本书即将出版，又使我感到些许的宽慰。因为春台同志所写的这些在思想上颇具深刻性、风格上颇具特色的作品，包括他晚年的最后几篇作品，不久可以作为专册同读者见面了。当本书的编者要求我为此书作序时，我作为春台同志几十年的老战友，觉得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

杂文，是散文的一种。它是一种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锋利为其特点，内容广泛，形式不一，如杂感、杂谈、杂记、随笔等等。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就有此类作品，以后历代传衍不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先生和其他一些作家，为了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针贬时弊，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向反动派或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进行战斗，把杂文发展成一种文艺性的论文。凡是读过鲁迅杂文的，都感到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上，行文感情饱满，逻辑性与形象化相结合，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诚然，鲁迅杂文是我国杂文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肯定了杂文的战斗作用；同时指出，在人民政权下，杂文的笔法不必隐晦曲折，可以大声疾呼，使人民容易看懂。解放区和新中国的作家们正是这样做的。

在新中国，杂文的战斗性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许多作家以杂文为武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从内容上看，大多是关于思想、哲理、政治以至社会、伦理、风尚等方面的。当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关于经济方面的杂文，据我所知，为数还不很多，这与当前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现实生活，恐怕还有些不太相称吧。

春台同志是财经部门的一个实际工作者。据我了解，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要当作家或杂文作家，他的主要作品还是财经理论方面的。在他看到经济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觉得应当鸣鼓而攻之；看到一些新生事物，觉得应当欢呼助威，而又来不及撰写系统的学术论文时，就随时拿起笔来写了一些随感之类的短文。这些短文生动泼辣、针对性强，在报刊发表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就产生了本书所收集的这些“财经杂文”。毫无疑问，他是受了前辈和当代杂文作家的启发和影响的。春台同志的杂文，如果单从文学性来看，或许有不足之处，但他毕竟是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财经专家（他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顾问、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在财经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加上内容富有哲理性，文风活泼、隽永，这样就形成了他的以财经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具有自己风格的杂文。

挞伐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和错误思想，是本书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不仅用算帐的方法和“一束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古诗来批判那些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现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吃喝达到了什么阶段》）；而且用“木匠戴枷，自作自受”的俗语，警醒那些以权谋私的干部和共产党员。本来，“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而这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地把以权谋私这个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特权与枷锁》）。对于某些事物，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在人们

往往不大注意的方面一针见血的提出问题。当报刊电台报导那些危害人民健康的假药被没收付之一炬的时候，人人拍手称快。但作者却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焚烧这些假药，损失到底是谁的？生产和销售假药的单位和个人已坐收其利，除个别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的。“人们从焚烧假药、只烧国家财政的熊熊烈火中，看到大锅饭不是被打破，而是越开越大了，越吃越香了。”（《岂能一烧了之？》）这就提醒人们必须深化改革，真正打破大锅饭。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民内部存在的不良现象的批判既是尖锐深刻的，又是满腔热情、与人为善的。

为社会主义的正气“鼓与呼”，是这本杂文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且不说以革命前辈始终如一的艰苦奋斗作风对比今天某些人讲豪华、摆阔气等等文章，作者着意从更广阔的视野给人以启迪。正当人们对企业中厂长与党委书记的关系议论纷纷的时候，作者写下了《刘邓关系——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文。当然，军事与经济不同，厂长与书记也不等同于司令员与政委，但事理是相通的，作者认为“刘邓关系”是厂长与书记关系的楷模与表率。作者围绕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这句话，以感人的事实说明他们两人如何诚恳相待、团结共事、工作协调、感情融洽。作者还注意从普通人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在《向家庭女财政部长们学习》一文中，作者首先颂扬了数学博士张鹤龄的乡下妻子在他出国留学期间以微薄的收入把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从而被这位博士称为“我们家庭的经济博士”的事迹；同时，又从自己家庭的理财之道中细心观察，以“仿生学”的观点提出国家理财之道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设想。作者还以其他战线的模范事例和高尚精神来激励经济工作者。他在《要有一股共产主义傻劲》一文

中，引用运动界“好教练是疯子，好运动员是傻子”这句含有哲理的幽默话语，颂扬了我国女排中“疯子”和“傻子”们真正的大智大勇，为祖国扬眉吐气的崇高品德。他还套用陶行知先生“傻瓜，傻瓜，救我中华”的诗句，以“傻瓜，傻瓜，振兴中华”，来鼓舞大家埋头苦干，建设祖国。

围绕一些经济生活中比较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以杂文的形式谈思想、讲道理、议政策，是本书杂文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目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没有成规可循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往往是矛盾重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抓住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凭借他几十年经济工作的经验阅历，博引旁证，娓娓动听地加以剖析论述，阐明自己的观点。诸如《量力与尽力》、《“松绑”与法制》、《死与活》、《欢庆与信心》、《过犹不及》、《未然之言与不及之悔》、《忍小谋大》、《慈不理财》、《一“超”一“高”值得研究》、《‘副作用研究所’和不可行性研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谈谈财政工作中的辩证法》，等等。这些杂文中，前期所写的大多侧重于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防止再犯急于求成、超越国力的“左”倾错误的；后期所写的杂文，除了反复提醒人们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之外，又写了不少反对片面强调分散、忽视宏观管理倾向的杂文，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杂文。他分析问题总是力求从实际出发，坚持两点论，不搞一点论，既反对主要倾向，又防止掩盖另一种倾向，既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又讲明它的条件性，其中洋溢着辩证精神，从而使它具有思想上的深度，和产生较强的说服力。这些杂文中同样力求把深刻的道理寓于生动、形象的比喻之中。在说到放开搞活不能忽视宏观经济管理时，借用了“带闸的汽车才能快跑”，“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必须有紧箍咒”，“最能发挥个性的音乐舞蹈必须有严

格的节律和协调统一的动作”，这些比喻是多么贴切啊！在说到经济管理必须首先抓好基础工作，不能认为“整顿”不如“改革”光彩时，借用了印度“三重楼喻”，说有一个人提出：“不欲建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建最上层之屋”，不是令人忍俊不禁吗？作者还引用我国古代许多成语、故事来说明问题。如在说到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就投资论投资一类的问题时，引用王安石“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陆游的“汝果要学诗，则功夫在诗外”的话；在说到财政的重要时，引用古人评论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中，认为萧何虽无战功，但保证财粮供应，乃“万世之功”的故事；在说到理财者应做清廉的表率时，引用唐朝著名理财家刘晏，执掌财政大权二十年，死后“禄薄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斗，人服其廉”的故事；诸如此类。这不仅加强了说服力，而且对于那些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不注意学习民族优良传统的人，不啻是一剂良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春台同志经常以伟大诗人屈原的这句名言自勉。他的财经杂文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都是同大家一起探索过程中的产物。

“我诚恳地希望，各种报刊，特别是财经方面的报刊，今后能多刊载些短小精悍、情文并茂的经济方面的杂文。作家们要努力熟悉经济问题，经济工作者要提高文学素养，大家共同努力，使有关经济的杂文创作更加繁荣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如果能在这方面起到一点推动作用，那就太好了；如果春台同志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我同春台同志在革命根据地征收农业税（救国公粮）的工作中，在建国后的财贸工作中，都曾长期共事。我们还合作写过《社会主义的银行工作》、《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两本书和一些论文。我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言，就权当最后一次的“合作”吧。这篇

序言，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我对他的思想和作品的理解与感受，也寄托着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永久的怀念。

李成瑞

1991年1月19日

吃喝风处于什么阶段呢？

读报随想之一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科学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同新民主主义论一样，为我们提供了同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划清界线的基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看，我们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是，翻阅报纸，却常看到不和谐的镜头：吃喝之风屡禁不止，社会集团追求高消费带了个坏头，争购高级小汽车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就不能不使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的吃喝风、追求高消费风处于什么阶段呢？

新华社1987年12月16日上海电：据上海市财务大检查办公室揭露，由轻工业部委托有关地区组织的一个TQC评审小组，对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手表四厂、前进锁厂三个企业的主要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进行评估。检查期间，大吃大喝，游山玩水，一行7人，20天时间，共花费企业29000多元，其中：

住宿费：平均每天500元，平均每人70元多。

膳食、宴请、水果饮料：平均每天726元，平均每人103元多。

礼品：每人150元多。

此外还有参观游览费、文娱摄影费、香烟以及所谓咨询费等。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是唐代诗人的感叹！我们这个检查组一天的开支，恐怕要相当贫困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了。

北京日报1987年12月1日报导：在追求高消费中，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即社会集团走在前面，其消费增长高于居民消费增长已有四年之久。社会集团购买力，1977年为134.7亿元，1986年达到462亿元，增长近两倍半，而同一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仅有一倍多。高级小轿车，1981年社会集团购买15728辆，金额3.4亿元，1986年购买115677辆，金额53.4亿元。五年内，数量增加6.3倍，用款增加14.7倍。五年来，小轿车增加30万辆，每年开支经费多达30亿元，这就是城市“车水马龙”繁华景象的代价。

进口这么多小汽车是否都是为了工作需要呢？不见得。1987年12月26日西安晚报报导，解放军政治学院内停放着21辆小汽车，拥挤着上百名地方同志，是干什么的呢？原来是西安市征兵办公室为100多名应征女青年进行体检。“公车私用”这便是一例。

社会集团的消费，除了坐车以外，其他吃、住、用也在向高档化发展。地毯、沙发、录音机、空调机、电视机也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1986年购买录相机就花了1.57亿元。机关的楼堂馆所，不仅新建的讲究高级、豪华、气派，标准越来越高，连原有

的也大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花在这方面的钱超过了生活资料方面的消费。更有甚者，一些贫困地区群众温饱尚未解决，可有的却不惜挪用扶贫资金、财政补贴，修建高级招待所，购买高级小轿车。

会议的伙食标准，过去是1元、2元，后来涨到3元、5元，已经不低了，执行中有的吃到8元，甚至有的吃到18元。难怪北京日报1987年12月26日读者来信呼吁，会议不要开成“吃喝会”。来信者认为，吃掉的不只是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吃掉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优良传统，污染了社会风气。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分配只能是生产成果的分配。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应当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还是低水平，怎么能提倡和追求高消费呢？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基本解决人民温饱，现在大体做到了。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那就是“摆脱贫困”了。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就是摆脱落后了。实现这个规划，从1956年算起，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目前正处于打基础和艰苦创业的时期。古语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能丢掉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个人，不顾子孙后代的基业呢？还有一个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在改革、开放、搞活，既有内债又有外债的条件下进行建设的，生产的成果只有在扣除还本付息以后才能分配和消费，用借来的钱办企业和用自己积累的钱办企业是不同的。这也是对消费的一个制约因素。

学习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要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和消费。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

实实在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把“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四化必备的“四个前提”之一，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和消费的指导方针。当前存在的“超”（超分配）和高（高消费）都是应当克服的。

（原载《财政》1988年第2期）

令行禁止，领导要带头

(读报随想之二)

读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文集，其中有两篇短文，读后颇受启发，感到禁止什么，提倡什么，令行禁止，领导带头是至关重要的。

一篇是叶长庚的“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叶当时是红八军第四师二团团长。军团长彭德怀陪同毛委员来检查工事，并交待：中午要在团部吃饭。叶长庚前几天在集市上，用自己的钱买了二斤腊肉，还没有舍得吃，这次拿出来交到伙房烧一烧，招待军团长和毛委员。所以，吃饭时桌上除了和大家一样的豆腐、炒芦菜以外，另有一盘红烧腊肉。彭和毛脸上立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毛说：“叶团长，搞么子特殊哟，快分给大家吃。”彭说：交待在你团吃饭，可没让搞两样菜，红军不兴这一套。叶赶忙解释说：“难得来。腊肉是自己掏腰包买的。”毛说：“这么说，是你请客啰！”接着挨桌分腊肉，边分边说：“团长请客，大家分吃腊肉。”

另一篇是王来音的回忆文章，他在1938年到1943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勤务员。他回忆说：陕北天气冷，冬天没帽子不行。部队作了一批毡帽，料不好，作工差，帽壳平塌塌，帽沿往下吊，样子不好看，谁也不愿戴。他拿回一个给毛主席看，并且说：“挺暖和，就是样子不好，怕人笑，没人肯戴。”毛主席把帽子掉过来掉过去看了看，“不错嘛，没人戴我戴。”说着把帽子戴上，还

到院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惹得大家都笑了。以后大家都乐于戴了，老百姓还编了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象钢炮子。”延安博物馆还有毛主席戴毡帽作报告的照片。

古语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何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现在用公款请客之风屡禁不止，固然是有人请客，重要的恐怕还是有人吃请。如果领导人和领导机关都象毛泽东和彭德怀那样，拿自己的钱请吃都不受欢迎，谁还敢用公款请客呢？如果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象毛泽东带毡帽那样，都乐意用国货，比如，领导干部都坐国产小轿车，谁还敢进口和使用高级豪华的进口车呢？

（原载《财政》1988年第3期）

自负盈亏的“自”，究竟指的是谁？

(读报随想之三)

增强国营企业的活力，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搞活企业中，人们对国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多有议论，主要是觉得企业只能负其盈，不能负其亏。其所以如此，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所有制问题，因而把改革所有制作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或核心。改革所有制的方案有种种，概括起来不外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有人认为这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必然结果）。有的主张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下放给企业的自有资金，以及由此新增的资产，实行资金分帐制度，把全民财产分成国家股和企业股，然后按股分红。有的还建议增加职工个人股份，实行国家、集体、职工三种股份，按股分红。甚至有的文章干脆主张，把国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大约占全部财产的50%）所有权无偿转让给企业，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企业集体股份（约占全部财产的30%），另一部分无偿转让给职工作为个人股份（约占全部财产的20%）。也有的走得更远一点，认为应当逐步过渡到政企分开的企业所有制，取消全民所有制，如此等等。按此思路推演下去，为了使企业能负其亏，似乎只有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集体所有制、半私有制、私有制或名公实私才能办得到。因为最典型的自负盈亏的是私营企业。这样的思路，简直要把人引入歧途。